

学者面对面

传承敦煌文化 加强交流互鉴

——郑炳林教授谈敦煌学研究

本报记者 张丽

编者按:

敦煌文化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的珍贵史料。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郑炳林致力于敦煌学研究数十年，日前由他主编的《敦煌通史》历时十余年出版，系统呈现了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的历史变迁，为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基础。同时，由他参与的“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也在有序推进。

人民政协报记者专访郑炳林，请他从推动文化传播发展角度，谈谈如何进一步推动敦煌学研究走向新高度。



《敦煌通史》 郑炳林 主编

立足文献研究,推动敦煌学研究成果不断深化

学术家园: 您主编的七卷本《敦煌通史》于日前出版。该书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通史”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学术团队项目“敦煌河西碑铭与河西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其编纂出版的意义是什么？具有怎样的特色？

郑炳林: 关于敦煌学，晚唐五代宋初这段时期的敦煌历史，因为敦煌文书资料翔实，已经非常明确，而在这段时期之前及之后的敦煌历史，因资料相较匮乏而比较模糊。《敦煌通史》分为两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前期卷、吐蕃卷、晚唐归义军卷、五代宋初归义军卷、西夏元明清卷等七卷，旨在对秦汉至明清时期敦煌地区的历史进行贯通性、总结性的研究，系统呈现敦煌及丝绸之路东段的历史变迁。

比如汉代时期的敦煌历史，单靠《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相关资料梳理远远不够。上世纪90年代初，敦煌悬泉、马圈湾等地发掘出土一批汉简，几万枚出土汉简详细记载了汉代时期的敦煌，揭

示了一个全新的敦煌面貌。但这批汉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学界并不清楚。2007年准备这一项目时就遇到这样的问题。随着汉简相关材料的陆续公布，如今已掌握大部分汉简材料所记载内容，虽不全面，但已经可以清晰地还原两汉时期敦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梳理出来。

这批汉简文献，一方面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相关史料相印证，另一方面则补充《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记载之不足。发生在西域的很多事件，《史记》等大多按正史体例有所涉猎，但不充分，而汉简则将这些事件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与细节呈现出来。比如西汉时期，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地区控制权，因匈奴统辖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归附汉朝，汉朝最终掌握西域地区控制权，并设置西域都护府，由首任都护郑吉迎接日逐王。根据史书记载，双方接触过程并不详尽，汉简则有详细记载。其中有部分匈奴人行至河西时反悔归降，《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时认为河西就是兰州，而汉简所记载资料证实河西就是在塔里木河。除此，敦煌郡与两河设置、移民实边以及对西域、匈奴、南羌等周边势力的经营等方面，在《敦煌通史》中，利用悬泉汉简、马圈湾汉简以及敦煌文献等出土资料，都进行了较为详细而系统的研究。当然，这部书不是汉代敦煌历史

的终结，而只是开了一个头。

学术家园: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也在有序推进。作为20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敦煌文献目前研究现状如何？

郑炳林: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实施，包括《敦煌文献全集》《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敦煌文献综合全集》《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等内容。近来，我主要在做好百部敦煌研究著作的精选与出版。这百部敦煌研究著作，包括已出版的优秀论著的重版，以及优秀新作的初版，可以说是“优中选优”。

实际上敦煌学研究工作始终在不断向前推进，我在兰州大学主要集中于敦煌文献的分类整理与文献专题研究，据此已通过两部系列丛书陆续推出部分成果。一是由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现已出版第一辑20本，第二辑20本正陆续出版。二是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研究丛书”，现已出版第一辑20本，即将出版第二辑20本。从这些阶段性学术成果中，再提炼出质量较高的成果，纳入百部敦煌研究著作中。当然，百部敦煌研究著作出版，并不局限于兰州大学相关学术成果，而是包括国内整个敦煌学术界。随着敦煌学研究队伍的扩大，学术成果必然不断丰富，研究内容也将持续深入。

做好理论阐释,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

学术家园: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运用敦煌文化遗产这一宝贵资源，进一步做好相关理论阐释，为“一带一路”等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如何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等，并阐述好这些思想精神的时代内涵？

郑炳林: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如何做好实施工作，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在新时代背景下，聚焦敦煌历史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各地区友好交流的历史传统，充分挖掘它的当代价值，通过深入研究，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交流、促进各国文明对话和文

化交流提供理论支撑。

古代敦煌本身就是多地区多民族交流交融的产物，它的文化，是多元文化荟萃；它的居民，是多地区多民族聚居，它成为当时中原地区与西域地区沟通的桥梁。比如，汉朝时期中原地区先进的水利技术，就是经由敦煌传至西域包括现在的中亚地区，为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水利建设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了解敦煌文化，就是了解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古代敦煌，佛教、袄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和谐共存，汉文化与外来文化兼容并包，比如为了贸易交流方便，胡人学习汉文化积极性很高，而汉朝也设置相关机构用于学习外来文化，可以看出古代敦煌实际是中外文化交流交融的中转站。

学术家园: 作为敦煌学研究者，在做好相关深入研究外，如何做好敦煌文化的推广传播，以更好讲好敦煌故事？

郑炳林: 最近，敦煌文化产业研究院在兰州大学成立，主要开展敦煌文化的推广与传播。那么，作为敦煌学研究者，我们应该通过哪些途径对敦煌文化进行有效推广与传播呢？首先可以通过影视等媒体手段，让更多民众广泛了解敦煌的文化内涵。同时还要把学术含量高深的研究成果普及化通俗化。比如刚刚出版的七卷本《敦煌通史》，一卷本就有四五十万字，分量太大，普通学者或者普通敦煌文化爱好者阅读起来比较吃力，下一步就是将这套书凝练成一本50万字的论著，并推出外文版，让国内外读者都能较为便捷地系统了解敦煌历史文化。再下一步就是将其变成4万字的图文并茂的青少年历史读物，让更多青少年了解什么是敦煌文化，什么是丝绸之路。当然，还可以据此开发具有敦煌元素的文化产品，通过在日常用品上附上精简说明，让敦煌文化逐渐走进千家万户，让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中了解敦煌文化、喜欢敦煌文化。

学术家园: 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敦煌学作为一门国际性学问，您认为，如何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

郑炳林: 掌握敦煌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需要在敦煌学各个领域作出成绩。敦煌学所涉领域较多，包括历史学、艺术学、宗教学、文学等。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胡语文献，比如回鹘文、梵文、古藏文等，其中有些文字已经灭绝，现在不再使用，但想要了解古代敦煌历史全貌，就不得不去研究这些文字所记载的文献资料，这就需要培养这一领域的人才。在敦煌学各个领域查漏补缺，才能守住这块阵地。中国敦煌学脉络不能断，不仅要不断培养人才，还要培养出一流人才，保证各个领域都要有自己的一流研究专家，保证各领域学术成果始终走在世界前沿，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与同领域研究专家对话时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敦煌学本身就是国际性的，因为敦煌文献流散于世界各地。中国敦煌学正在逐渐从跟跑世界变成领跑世界，但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也有很多领域存在不足。发展敦煌学，需要具备国际视野，不仅需要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还需要积极加强与国外学术界交流，鼓励世界各国学者联合攻关，来共同推动敦煌学研究进入新高度。



委员时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推进文化传承发展，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我深切体会到，作为一名文艺界政协委员，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必须准确把握好新的文化使命的丰富内涵，那就是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中国贡献。

如何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把握好守正和创新的关系。守正，就是要系统解析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密码，在著文弘道上做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创新，就是要在做好“两个结合”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文艺工作实践，不断推出体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精品。必须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战略任务的科学擘画、精心部署和具体要求，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去创新、创造，推动新时代文艺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是中华文化最为宝贵的基因，必须在新时代加以弘扬光大。孔子之所以推崇西周的礼仪制度，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周代在国家运行规制上不拘泥于旧制，具有创造创新精神，所以孔子得出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结论。西周对规制的重视，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法治精神，孔子说的“维新”则是改革的旧称。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被历代有识之士所认同，原因就是这句名言体现了先人的创新意识。今天，我们继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赓续创新基因，不负时代召唤，让中华文明像滚滚长河一样源远流长。

文化传承和现代文明建设非一日之功可成，更非一己之力所为，它是一个民族整体定向运动和积极作为的结果。因此，凝聚人民群众力量，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坚持自信自强，坚持创新发展，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光荣的使命，也是一个文艺界政协委员的神圣职责。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成立政协时的初心所在，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深刻理

委员说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李六三:

创新推动遗址保护利用

不久前举行的全国考古工作会全面回顾了“十三五”以来我国考古工作的发展成就，提出新时代中国考古工作的总思路总目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李六三就遗址保护利用实践问题进行了阐释。据李六三介绍，国务院《“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遗址保护关键技术攻关。目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坚持遗址病害机理研究、科学试验、风险评估、保护利用等全过程导向，在遗址保护方面重点开展材料学、原位诊断、预防性保护、保护质量评价等研究。

针对大遗址保护的创新推动和有效利用问题，李六三建议加大考古遗址重要遗址现场的原状保护：一是要在第一时间对重要考古遗址实施科学

推动新时代文艺高质量发展

滕贞甫

解这一“初心”，响应党的号召，通过政协这个专门协商机构凝聚智慧和力量，服务并助力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夯实基础、搭建载体、推动实践的有力举措。在这场新的思想解放洪流中，政协委员不能做旁观者、评论者，而是要投身洪流，做勇敢的捍卫者、建设者。

新时代以来，我一直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厚植文化根脉，自觉做好“传承”的文章。我的长篇小说《刀兵过》传递的是“揭山易，揭中华文化难”这样一种认识；我的文化随笔集《探古求今说儒学》《孔子另说》对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做了系统梳理和阐释。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依依墟里烟》，也是从乡村文明绵延发展的视角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下一步，我要继续深耕传统积淀，培育现代文明果实，为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辽宁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



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 在“角色”中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在上海书展举办之际，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携新书《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与读者朋友见面，分享了《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一书的出版故事。

在话剧舞台上饰演李白30年，濮存昕不仅演成了“李白本白”，也在创作李白、更通过李白感悟表演和人生。濮存昕说，李白的伟大不仅在于他诗歌的音乐性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更是因为他的精神和气节。濮存昕说，“我们没有遗忘李白，李白之就永远没有离开。”这是一位演员对自己所演绎角色的真情流露，也是对历史、对生活极为深刻的洞察。

谈到鲁迅，濮存昕以《野草》中的“我将大笑，我将歌唱”讲述了自己接到电影《鲁迅》出演邀请时的心情，分享了自己通过阅读了解鲁迅生平、揣摩鲁迅形象、树立人物形象的经过。作为传统文化的弘扬者、诵读艺术的推广者，濮存昕还在现场朗诵了自己最喜爱的鲁迅作品《野草·题辞》。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乐融也加入活动，与濮存昕交流了对鲁迅生平、作品及后世对鲁迅先生演绎的一些思考。濮存昕认为，鲁迅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他的作品永远值得重温，他的精神永远值得纪念。

(杨雪)

文化信息

活化经典、传承文脉

8月19日，由中国美术馆、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的“奔腾的精神——徐悲鸿中国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本次展览展出徐悲鸿不同时期的中国画、书法作品40余件。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徐悲鸿先生塑造的马，豪气勃发、精神抖擞，独具品格，以其胸怀壮志，毫无羁绊，奔腾向前、激越昂扬。昔日，徐悲鸿先生有“欲求艺术中兴，配合国

家复兴大业”之理想；今日，他的作品仍不断激发着新时代艺术家的创新创造精神。

2018年1月，中国美术馆联合徐悲鸿纪念馆策划、主办了“民族与时代——徐悲鸿主题创作大展”，受到观众喜爱。时隔五载，中国美术馆联合贵州省博物馆，并得到江苏省美术馆的支持，梳理出徐悲鸿的另一批优秀作品，以集萃汇珍、活化经典、传承文脉的形式，带给观众新的审美感受。

(张丽)

探析题李白诗稿的艺术价值

日前，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部主任李致忠主编的《诗仙归来：〈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诗稿的鉴定与探析》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该书中收录了《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归国前后，诸位专家逐渐从笔法墨色、纸张成分直至历史考据的鉴定文章，

(郭海瑾)